

发展改革动态

2020年第8期共137期

发展规划处

2021年5月15日

【聚焦评价改革】

董云川：达成“四律”共识 化解“五唯”焦虑

摘要：在中国教育的发展语境之中，“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问题日益凸显，积弊自有源头。化解“五唯”焦虑的方法不在“唯与不唯”或非此即彼之间。“五唯”的症结肇始于“唯独”，而“唯独”的破解之道在于“唯实”，“唯实”的根本无非放弃“一维”实现“多维”，最终落实于“唯众生(非权贵)”“唯本体(教育存在)”“唯实践(真理标准)”的教育之中。为此，必须在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四律”共识，通过对教育规律的重新认知去改良教育的促进和评价政策，以灵活开放的制度来激发教育组织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如是，中国高等教育必将焕发勃勃生机。

关键词：破五唯；教育评价；唯实；四律共识；教育根本

一、“唯独”积弊

近来，高等学府里热议的话题之一莫过于“五唯”的破解，领导有指示，政策有明鉴，业界有响应。这个论题的发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高屋建瓴地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紧随其后，贯彻行动以及专题研讨似潮水般延展开来，后续出台的行业文件和领导讲话又各有侧重，于是，就有了不谈帽子问题的“四唯”说法，以及强调资历和奖项而不提分数和升学的“新五唯”提法。“诸葛亮们”指点江山，各显神通，似乎原来横行霸道的“五唯”皆他人之过，责任均不在自己，而彻底破解“五唯”困境的希望也迅速在上级的一声号令之下曙光乍现，成果大有近在咫尺之势。理智地分析，“唯”是动态词，代表主观取向，有强烈的动作感，既可以“一唯”，亦可以“无数唯”，因此，“四唯”“五唯”“新五唯”怎么说都不重要，无非似扑灯蛾般忽而东、忽而西，缺乏定义，亦无理数。

就当前情况看，高等教育界的反应大体一分为二：在行动方面，作为办学主体的高等学校及其习惯于被指导、被安排、被指挥、被引领的科研处、人事处、教务处等相关部门忽然觉得不知所措了——如果论文不计篇数、级别、奖项，学术没有项目及其经费支撑，也不再为人才头上戴着的那顶金光四射的帽子议价了，那么评职晋升以何为凭，奖金发放以何为据，引进帽子下面那个光头又有什么价值呢？于是乎，所谓的“管理工作”当即陷入了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原来所依靠的那些计量指征和操作刻度经过多年的运作早就习以为常，形成惯性，不论合理与否，均十分容易贯彻实施，现在如果统统不提了，面对师生们的教研业绩居然不知道该如何判定了。而在舆论方面，专家学者犹如刚刚才被政策从梦中唤醒，短时间内纵横捭阖，尽数“五唯”之弊，不吐不快，详列化解之招式策略，听起来易如反掌。其实，就本人看来，“五唯”之弊根本不在“五唯”本身，无非“唯独”或称“一唯”而已，而“唯独”的现实体现无非“唯上”“唯书”和“唯外”。破除痼疾的关键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当年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复讨论的，如何才能避免少犯错误的那个问题——“不唯上；不唯书”。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说：“‘唯’字的根源是超越专业‘权力’，甚至凌驾于专业‘权力’之上的‘权力’。”分数是学习状况的计量刻度，何错之有？升学是教育层级的自然递进过程，何错之有？文凭是学业合格的一纸证明，何错之有？论文是科研成果的文字记载方式，何错之有？帽子是追求品牌格调的一种标志，何错之有？面对着鲜活的教育生命主体，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校想“唯啥”都不错。只是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唯上(规训)”的举止、“唯书(教条)”的因循和“唯外(逐利)”的言行严重干扰、大幅削弱了学术和教育自身的价值逻辑，积重难返之后，才叠加出了现在教育界人人垢病的“五唯”之重症。二十世纪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早就有言在先：“奖励什么，就得到什么。奖励天才，就会得到成功者，奖励作戏，就会得到演员。因此，“五唯”之弊正是教育政策及其奖励实践的一元化倾向，历经日积月累形成的必然后果。政策鼓励、资源聚集于“一维”“唯独”之途，容不得曲径通幽的人文路径，等不及循环往复的科学实验，耐不住润物无声的教育耕耘，当然也就怪不得大家要争先恐后、扎堆抢夺同一高地了。历经千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表明，唯有政策开放多元，才能造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继而创新迭出的教育局面。未来，分数还是要登记，升学也要不间断，文凭当然要获取，项目研究要进行，学术论文必须写，学问帽子尤需努力博取，否则，何以证明教书育人的合法资质，又有何资本去攻克学术前沿，攀登科学高峰，践行立德树人的功绩呢？

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就联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富于哲理的思考。他认为毛主席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于是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至理名言。如果说“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范畴，那么，“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则是陈云对其含义作出的通俗易懂的诠释。在高等教育领域，“唯书”所体现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唯外”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这两种表现均与“唯上”直接关联。此“三唯”追求聚合而成“唯独”的高等教育取向，对冲了教书育人服务于多样化生命成长的本质，高深学术致力于文化科学推陈出新的根性，以及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改良进步的天职。陈云同志这句话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实践有机、通俗地结合起来，我们可以领会到“学与用”、“知与行”，以及对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的辩证统一。2015年6

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对这一思想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五唯”积弊深重，自当摆脱。如若“不唯”，又该何去何从？于是，许多人提出了新时代的各种“该唯”之事。孰是孰非？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兰特夫妇在《历史的教训》中告诉我们：“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做法；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正因此如此，举凡“唯与不唯”皆不能够草率选择，也不能够由谁来主观圈点，更不能朝令夕改，政出多门即兴绑定。虽不能预设框定，但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毕竟是有方向的一实事求是的教育发展首先要保证遵循教育的规律，而“唯实”就是检验政令言行是否遵循了教育规律的合法参照系，通过“唯实”大力激发大学创新，激活学术生态，释放教育生产力，无疑是破解“五唯”的有效法宝，更是促进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正途。

二、“唯实”辨析

教育生命是多样的，与之相应，评价要“唯实”，当然就不能“唯一”，而只能“唯多”。“多”恰似文化教育科技进步的催化剂，可以成为化解“独”的生境和突破口，善治“一花独放不是春”的困局。“多与实”能够促成开放系统，“一与独”容易形成封闭系统。封闭必然导致“唯上”“唯书”的学术范式，而开放则有助于促进“唯本体”“唯生命”的教育追求。

然而，“唯实”并不简单，更不容易。何以为“虚”，何以为“实”？这绝不仅仅是个操作性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认识问题和哲学问题。由认识决定思想，思想引发决策，决策确立导向，导向引领评价，评价连带资源，资源诱发行动。而进一步将其置入高等教育现实情境之后，很容易造成被模糊、被混淆、甚至被颠倒的困局。如若文化认知和教育决策出现差池，高等学校的行动导向亦会相应出偏，如若功利诱导的回报过于直接，则机会主义必然盛行，紧随其后的评价活动当然就不可避免地引发资源误集、急功近利、重利忘义、舍本逐末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最后，舍弃了根本的教育必然走向虚浮、集体平庸，甚至有可能误入歧途。

“唯实”之举重在“唯众生(非权贵)”“唯本体(教育存在)”“唯实践(真理标准)”。

“五唯”积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虚实颠倒，本末倒置。多种巧立名目的教育评价活动假借五花八门自以为很“实”的指标，把教育的生长活力捆绑框定了。所以，本文有必要对直接关乎到教育生命发展指征的“虚与实”做一番正本清源的讨论。

历史经验证明，解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迁逻辑如果只从现象层面展开，无非缘木求鱼之举，难得善解，再加之当今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政策的擅变，致使教育的问题愈发错综复杂，必须从根子上剖析开来，才有助于明了究竟。否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周而复始，终无法避免同一种毛病在不同的时期屡屡再犯。众所周知，仅就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的号令及其评价的话语方式而言，就变化多端而且难以把握。例如，何时该，何时不该？何时准，何时不准？何时大力倡导，何时严厉禁止？说法不一还常变常新。上行下效之余，教育改革的初衷和美好意愿随着政令指标信息的逐级传递而变形衰减，高等学校及其师生面对变动漂移的风头往往陷入迷茫，不知所措。

对教育发展的促进和评价如若取向于“唯实”，首先得要明辨教育活动的虚与实，否则，难免落入刻舟求剑之陷阱。对此，不妨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找一点依据。

老子称，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所有的事物从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有生有，却不知道内在的衍生逻辑其实是无中生有。“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结论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办学需要条件，需要地盘，需要大楼，需要资金，需要设备，无可厚非，但是如若缺少精神，没有文化理想和科学梦想，即便短期上位，抢占了山头也无非昙花一现。人作为生命的个体，无非由骨骼、细胞和碳水化合物等物质组合而成，学生学者的生存需要物质前提，教育的理想要指向健康快乐，如若缺少灵魂和意志，找不到价值皈依的感受，学者何以创新成就自己，更遑论去成就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条件极其简陋、内忧外患的西南联大，可以连续、非偶然地培养出那么多的优秀人才；才能理解井冈山的革命者“小米加步枪”的内在力量；也才能明了为什么有些小大学创造出了大成就，一些持续创新的大学未必是条件最富足的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涂又光先生认为文化是“有而不在”的。你可以深切地感知到，却无法简单地呈现出来。这样看来，我们在迎接教育评估时领着专家们逛一逛校园，看一看根据指标要求拷贝出来的一堆堆同质化的支撑材料，能否就可以有效证明该校的办学精神、教育理念？庄子指出：“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在人工智能粉墨登场的现代乃至未来，什么才是有用的专业，什么课程学了更有用？家长不了解，社会不清楚，你以为搞评价的专家就都懂吗？传统教育重知识之传教，未来教育必重智慧之培育。今天的高等教育，如果再不努力成为“转识成智”的文化组织，继续痴迷于“看起来有用”的“五唯”应景之作，而轻视“无用之大用”的人文智慧、教育情怀和科学精神，就真的对不起老祖宗的真知灼见了。《易经·系辞》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并举，协同作用，“以道花天下”当然是现代高等教育最好的选择。然而，今天大学之所作所为以及通过浮光掠影的评价活动所促成的状况，在杨叔子院士看来，无非偏重了“制器”而忽视了“育人”。他明示：教育不是制器。

佛学北传，中国禅宗兴起，开辟了新的智慧天地，与儒、道融合，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宝库。释迦的认识体系极为庞大，包括“二圣谛、三法印、四圣谛、五蕴、六识、八正道、十二因缘”。本人根据自己的研习体会，结合中国禅宗的参机妙应，透过当今社会现象，尝试从“俗谛”与“真谛”二个维度对“虚与实”的问题进行一番深入地辨析。前者是世俗见地和求索重心，后者为根本认知和真理诉求。紧扣当下的高等教育发展实际所创建出的示意表格，可以直观说明教育评价行为取向的轻重、虚实及其连带的后果。

展开分析如下：

首先，“像与象”这两个字的差异从表面上看，在于有没有单人旁，其间真正的区别却是前者是看得见的，比如影像、图像、浪涛；而后者是看不见的，比如天象、气象、洋流。哪个词更接近事物本真？显然是后者。其次，“声音”一词由两部分构成，“声”是听得见的，用物理仪器可以测出波长及频率，而“音”是经由听觉传递，再综合神经系统加工之后才感受到的，悦耳与否，有没有磁性，好不好听，由“音”所决定，所以才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之说。第三，众人皆知“内外”有别，“外”所重者，条件形象而已，“内”所求者，品质格调也。孰轻孰重，不言自明，然世俗之举皆跟风追潮，外取喧嚣。第四，事物发展有“远近”之差，高瞻远瞩与急功近利之间的差别不言而喻，高下立现，然而一经转化为现实行动，却极少有人舍近求

远，大多数争先恐后，唯恐失去滩头，因此众生皆慌乱于燃眉之急，而漠然于诗和远方。第五，再看“形势”一词，原本各属一端，孙子兵法曾分篇而论，“形”者，兵马、粮草、辎重、兵器也，“势”者，时机、布局、气场、变数也。自古以来，以小搏大，以弱胜强事例无数，皆得之于后者；而贪多求大，昙花一现，徒有虚名者却重蹈覆辙，前赴后继。第六，战略策略，无非“术与道”二者的切磋契合，然而世人无不陶醉于花拳绣腿，却鲜有庖丁解牛的觉悟——看起来游刃有余有余于机巧方术，其实得益于融通天下无形之大道。

如此辨析下来，本人的观点也就不言自明了：事物皆有形神两面，前一部分是表实里虚，亦即看起来实，其实相当虚；后一部分是表虚里实，就是看起来虚，其实相当实。无疑，当下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评价诉求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重心失衡之象。我们以为前者“实在”因而重视有加，以为后者“虚无”因而忽视轻待。于是乎，当前某些流行的教育文化形态和学术探索言行，就落入了虚实错位、本末倒置的深渊而且不自觉、不自知。抉择不当、重心偏颇之后，被弱化的恰恰是大学理想和教育情怀，被忽视的无非科学精神和探究理念。直观地说就是缺思想，缺情感，还缺价值共振。这些看起来“虚”的东西恰恰是近年来教育评价及发展诉求中最缺乏的“实在”的东西，必须被高度关注。鸿摩罗什与唐玄奘所译《心经》相隔 204 年，用词表达方式各有不同，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八个字却分毫不差。反观总体，高等教育的生长进步，从来离不开色与空交融、虚与实并举的协同功效，以及对有形物质与无形精神、稳定制度与创新思想、明确手段与动态资源的综合运用。回望现实，分数是中性的，如何看待分数才是有意义的；论文是实在的，如何评价论文质量才是根本的；升级是无可厚非的，如何选拔上位才是合理的；文凭是没错的，怎样获得文凭才是重要的；学术探究是必须的，但人人都立项却是值得怀疑的；学术成就获奖顺理成章，但把获奖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荒谬的；帽子依然可以成为时尚的装点，但戴着帽子的脑袋才是是非曲直的源头。现在的症结是阶段性的选择失当：该抓的没抓，不该举的乱举；该放的没放，该管的没管！

一言以蔽之，形神相较神为根，虚实权衡实为本。这里的实，正是学术真理，实践智慧，教育规律，文化法则，科学逻辑；教育“唯实”，就是要唯学术、唯真理、唯人性、唯生命、唯文化、唯科学。未来，与“唯实”相适应的教育促进活动应该理性划定边界，不能喧宾夺主，鹰越边界。必须承认，更多外部政策干预和评价活动所不能企及的领域恰恰是高等教育发展最精髓的地带和最需要填补的空白带。有鉴于此，教育评价要适可而止，知止则不殆。

三、“四律”共识

高等学校及其所属的学科和学人综合构成了一个超级复杂的教育生命系统，绝非简单固化、或者变来变去的评价体系可以甄别出来。事实上，高等教育系统天然具有自组织本性，其发展演进过程正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过程，自创生、自适应、自生长及阶梯演进形成了高等教育教学以及科学研究活动的主流。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无不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进程中，在组织和自组织机制的交互作用中得以实现。举凡政策理性的管控方法或技术理性的解释方法都难以揭示清楚复杂的学术系统和教学过程生成与运行的动态机制。高等学校这个复杂的组织系统一旦运行起来，内部的学科、专业、学者、学生以及外部的政策、环境、资源、用户之间就必然会产生无穷多的交互作用关系，联动起微妙而多重的精神和物质反应。在这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演

进过程中，政策生成显著的动因，资源联动强大的诱因，而教育自身的反应才是主要的成因。在混沌的科学文化世界与有序政府规制及直接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博弈会相应激发高等教育机构的自组织机能，不同的高校、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者穿梭往来其中，自会在积极地适应、中性地调适或消极地逃避之间做出抉择。自组织机制在暗中促使教育系统经历从产生到形成，从形成到发展，从发展到衰退，从旧结构的崩溃到新结构的再创生等不断螺旋上升的运动环节，最终凸显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高等教育现实。任何组织或个体，任何社会力量和干预方式都不能够简单对这个复杂系统的运行进行捆绑和规制。把话说透，卓越的教育行为绝非由外力直接促成，必须从内部和根子上深入，才能挖掘到促使教育生机勃勃的缘由。何帆在《变量》中描述道：“你只有在树林中才能见到碧绿的树叶，这片树叶一定连着树枝，树枝一定连着树干，树干一定连着根系。你不可能在天空中见到一片无依无靠且还能自由生长的树叶。最了解树木的人看到的并不是一枝一叶，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依愚者陋见，十分有必要重构认知基准，努力促使高等教育情境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达成“四律”共识，据此把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所需要的关联要素，包括政府、社会、评估中介、学校以及教育情境中的个体等多方角色都有机地植入整体，立体地构建出一个模糊的教育生长框架。透过这个分析框架，可以大体上看明白高等教育发展的丛林生态轮廓。

“五唯”本身无过，过在喧宾夺主，倚重了指标而忽视了内涵。综上所述，孤立地强调“唯”与“不唯”，皆非明智之举，亦不可能两全。而如果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就必须另外创建一套法律、规律、节律、韵律协调并举的“四律”认知与促进框架。换言之，高等教育的改良进步与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守法律，遵循规律，顺应节律，追求韵律。

“法律”规定着高等教育运行的范围。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推动教育、文化、科技发展，并代表纳税人从教育外部监控高等学校的办学行为，无论是直接发布政令还是借助社会中介力量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干预，都享有相当的合法性，但同时也必须具有明确的边界。现代大学发展的“四A”原则之一即“社会问责”。学校不能逾越规范办学而政府不能插手内部事务，已成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共识。政府在新时代的作为方式需要顺应社会进步的大趋势，对于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其角色体现既不能缺位，更不能越位。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从来离不开政府的引领和监督，但是高等教育及学术自身的言行取舍也需要相应得到政府的合法保护。代表社会的政府与代表高等教育的大学都要担其所应当，而止其必须止。双方的越界行为均需受到法律的约束。如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就会锦上添花，渐入佳境。

“规律”决定了高等教育组织的运行模式。高等学校是传播高级文化，探究高深学术，培养高级人才的文化组织，其运行发展自有其与政治、经济不一样的规律。毋庸置疑，作为超级复杂的文化系统和高素质人群聚集的科学机构，大学对社会的发展变迁所带来生存环境变化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具有超过其他任何社会组织的敏锐嗅觉，而其自身所具有的应对、调节和纠偏机能也必然优于其他社会组织。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不同学校的生存、竞争与发展总是会通过自适应或自我改良，寻找到最合适的生态位。不同的学校战略会有不同，重心会有变化，步伐会有先后，或许技术路径迥异，操作策略互不相干，但是只要遵循了教育的规律，外部适应社会生存环境并推动了社会进步，内部适应个体生命的成长逻辑并培育出健康快乐的新一代，则善莫大

焉。历史经验证明:尊重教育规律,则大学昌盛;违背教育规律,则大学衰落。中外高等教育史上的成功办学案例有据可查。

“节律”揭示出教育和学术的自然发展样态。教育有周期,需要静待花开,不能够堰苗助长;学术探究活动既要证实也要证伪,惟有通过时间、空间和相关条件的循环检验,世人所津津乐道的学术成果方得以确立;学科生长、衍化、发展也自有其逻辑,无论文、理、医、农、工、管、艺,生长范式各有千秋,不同的学科在同一所大学内或者是在大学联盟之间的交叉融合,首先源于自身改良的冲动,然后还取决于天时、地利及人和的机缘。以破坏学科生长节律为代价的任何不恰当的外力作用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均有害于大学学术的健康发展。科学高峰险峻,学术高地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学者个体及学术共同体的自觉互动、耐心等待和持续坚守。十年面壁冷板凳,百年树人真本色;循序渐进之后,方才玉汝于成;每日枯燥,何以一鸣惊人?

“韵律”彰显出学者和学生的个性品质和格调。社会由不同的行业综合构成,不同的行业又各有其生存法则及其品相表达方式。高等教育致力于通过科学创造和人才培养引领、服务、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但教育、文化和科学本身的基本诉求和价值呈现方式,却迥异于行政或经济的方式。与此相应,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人群明显具有与其他行业人群所不同的话语风格和行为风范,再加之高等教育系统自身所内含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特质,所以,即便身处同一个行业,或在同一所大学中谋生,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之间都会呈现出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样貌,而正是这种异彩和殊途的竞争与发展样貌,才决定了高等教育本身的活力和创造性。因此,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个性是生命力和创造精神不竭的源泉,过于强求一律,难免有意无意地阻碍个性的发展,从根本上削弱学科、学术、学者、学生的生长活力。为有源头活水来,政策的支持、社会的关心、第三方的介入,都必须以维护高等教育的生机和活力为鹄的,而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对学校、学科和学者所秉持个性的普遍尊重开始。惟其如此,教育评价中所标榜的“特色”号召才不会成为口头禅,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方能够尽现芳华,同时守护好“刚毅坚卓”的品格。

综上所述,达成“四律”共识势在必然,其前提也一目了然: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不缺位”,学校作为教育组织的代表“不逾矩”,学科作为学术存在的代表“不慌乱”,学者作为高知人群的代表“不媚俗”。在这一共识框架之下,各种角色的言行及价值取向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位次就明晰可辨了,良性而开放的教育发展系统亦将同步生成。相应地,“五唯”焦虑自然得以化解,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均可以各展其能,携手共图和谐并举之大同格局。

彼时,分数还要,关键看得分点;升学必然,关键在选择性;文凭在手,关键是含金量;论文必写,关键求思想;项目争取,关键图创新;奖状照领,关键要名副其实;帽子继续戴,关键比脑袋和精神。(原文刊载于《广东高教学会》)

作者简介:

董云川: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